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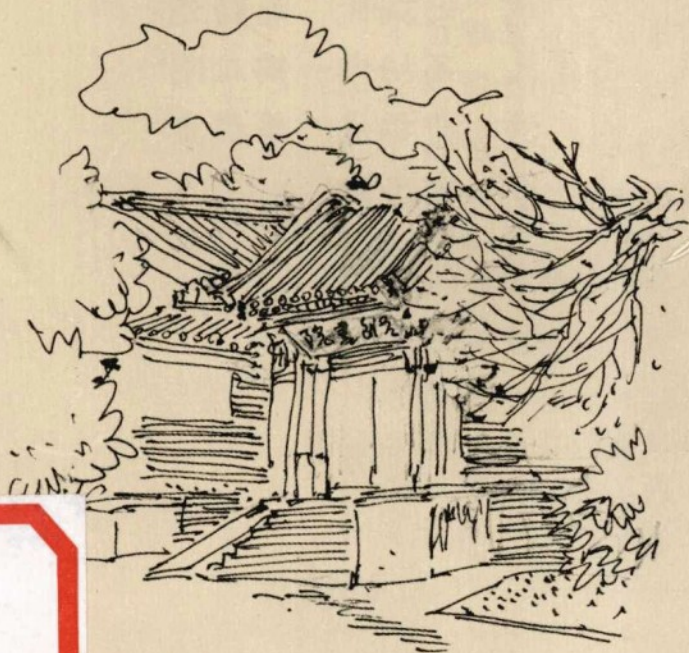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山西书院史话

主 编 李元庆 副主编 马志超

王志超 / 著

山西书院从兴起、发展、完善到最后废止，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过蓬勃发展的欢欣，也有过惨淡经营的辛酸。作为封建教育体制一个不可或缺部分的山西书院，对山西学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书院史话

王志超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建设南路 8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29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80598-343-7
K·111 定价:2.5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总 主 编：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宝库	牛崇辉
任茂棠	刘 江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李 鹏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建民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曹福成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数字图书馆
PDG



目 录

引子	(1)
一、悠远的先声	(3)
1、“王者之师”卜子夏	(4)
2、天下争说郭林宗	(6)
3、桃李满门“文中子”	(8)
二、点燃星星之火	(11)
1、山西的第一所书院	(11)
2、宋金时期的山西书院	(12)
3、元朝山西书院的勃兴	(13)
4、吕思诚与冠山书院	(15)
三、在磨难中成熟	(17)
1、薛瑄创立“河东学派”	(17)
2、明中期书院的迅猛发展	(19)
3、傅山与“三立祠”	(23)
4、历尽劫难的山西书院	(25)
四、铸就辉煌的业绩	(27)
1、康熙皇帝大兴书院	(27)
2、清中期书院政策的转变	(29)
3、日暮途穷的山西书院	(34)
4、晋阳书院与令德堂	(36)
结束语	(41)

引 子

什么是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官府或私人藏书、校书和读书、治学的地方，是古代学校的一种。

我国从古以来一直重视教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延续整个群体的生存，人们必须将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承担这一教育任务的一般是群体中的长者，而教育的形式大多是通过具体实际活动中的身教和口耳相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知识的积累，尤其是文字产生以后，学校随之出现，教育逐渐走向制度化。据古代文献记载，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正式的学校。西周时，学校分成“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城里的学校叫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各地还设有乡学，教育一般的贵族子弟，同时又是地方议事的场所。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教育制度也发生变化，过去由国家控制和垄断的“官学”被“私学”所代替。当时社会的一个新兴阶层“士”开始大办学堂，聚徒讲学，发表不同见解，形成不同学派。私家学校的增多，使得受教育的对象扩大了。孔子就是诸多创办私学者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因材施教，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后世影响很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文字的统一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人民接受教育和相互交流无疑大有好处。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儒家典

籍留存于世，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家学校几乎绝迹。直到西汉初，由于废除了秦代的禁令，学校才慢慢恢复、发展起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建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学习儒家经典，成绩优异者可以授给一定官职，这就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各级学校发展迅速，到东汉末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士族南下，使南方的教育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大变革。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附庸，但学校的招生对象大大扩大，不再限定必须是贵族的子弟了。这样，一般寒门素族也可以入学受教，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学校的教材仍是儒家著作，学习的目的也极其简单，就是要通过科举求取功名。及至宋元明清，教育制度虽前后有些变化，但都尊孔崇经，学校教育仍跳不出科举的樊篱。

书院的产生最初并不具学校的性质。据正史记载，最早的书院是唐朝时玄宗李隆基创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主要职能是收集、保存古代遗书，编辑、刻印儒家典籍，订正国家典章制度等。它设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等官职，实际上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和藏书、档案机关。宋以后，书院的性质才逐渐发生变化，从皇帝的咨询、顾问机关，变成讲学、肄业的场所，成为封建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部分。

书院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在教学方法上，书院一般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

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有时也议论时政;在教学目的上,书院虽也鼓励学生走科举之路,但它更注重学生素质、品德的培养;在师资力量上,书院大多延请当地、当时著名的文人或学者主讲,如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朱熹都曾主讲过,而其山长(也就是校长)更多是由全国知名的学者担任。在教育经费上,书院多为私人性质,经济独立,自置田产、校舍等。

由于书院教育和学校教育多有不同,因此书院更多的具有民间特征。书院常常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辩论学术,议论时政,发表见解,指斥时弊,如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就是通过东林书院讲学、辩论而形成的。书院的这种民间特征必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从元朝开始,元、明、清三代历朝皇帝都曾采取各种办法,使书院逐步官学化,突出其封建教育阵地的功能。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书院尽力保持其独特个性,在书院发展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痛感落后就要挨打,各方面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教育体制上,许多旧式书院改成了新式学堂,设立了算学、化学、地理、农林等科目,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下令停止科举,建立新式学校,中国的教育制度包括书院制度完成其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一、悠远的先声

山西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山西的第一个书院是

哪个？在书院出现以前，山西的学校和教育又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遥远的从前说起。

1、“王者之师”卜子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蜂起，各自称雄，社会急剧变革，思想异常活跃。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当时一个新兴的阶层“士”大办学堂，聚徒讲学，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主张，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学派，如法家、儒家、名家、纵横家等，史称“百家争鸣”。其中儒家的创始人就是孔子。由于孔子实行“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因此师从他的学生特别多，史载有弟子 3000，贤者 72。在他这 72 个优秀学生中，有一位叫卜子夏的魏国西河人，相传就是山西人。

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又称卜子。他是孔子学生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又因他很有文学修养，且接受力较强，所以深得孔子的喜爱。卜子夏跟从孔子多年，对孔子学说中的精华心领神会。孔子去世后，卜子夏仍专心研究孔子的著作，同时极力宣扬孔子的学说。

为了能使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卜子夏在回到故乡西河后，也像他的老师一样，广招徒弟，设堂讲学。“西河讲学”开创了山西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例，它虽没有书院之名却有书院之实，因此也可以说是山西书院的雏形。

西河邑最早的辖地，在今山西永济、陕西合阳和河南内黄一带。直到今天，山西境内的许多地方都留有子夏活动过的遗迹，如山西省芮城县有卜子墓、卜子祠等，表明卜子夏有可能葬于此地。又有专家研究考证说，卜子夏当年讲学的地方在今山西省河津市，此处当时属魏国所辖，卜子夏在这

里广收门徒，不仅宣传孔子学说，还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新学派——子夏之学，成为孔门后学八大流派之一。

到魏文侯时，卜子夏被聘为老师，成为“王者之师”。他经常向魏文侯讲授儒家经典，分析新乐与旧乐的区别，以乐喻道，传授为君之道。魏文侯是春秋战国时魏国的一代明君，又是一位“好学”、“好古”的君王，他曾广泛地拜师求教，“择其善者而从之”。拜子夏为师后，他学到不少儒家为政的道理，于是“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并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得到很高的评价。

子夏的学生中有两个较为有名，一个是段干木，另一个是田子方。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他们两人的贤名被人们津津乐道；又由于他们也被魏文侯礼聘为老师，于是他们和他们的老师子夏一起被人们称为“河东三贤”。子夏的学生中还有曾经在魏国主持变法的李悝、在楚国主持变法的吴起以及西门豹、禽滑厘等人，其中李悝、吴起、西门豹是战国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禽滑厘是墨家巨子，前述的段干木、田子方则归于道家，而魏文侯又集儒、法思想于一身，可见子夏学生并不局限于儒学一家。另外，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几乎全部出自三晋，或师从晋人，使山西成为法家思想的摇篮，同时像禽滑厘等人又是其他学派的主将，由此也可见子夏西河讲学对当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子夏西河讲学，虽无书院之名，但已有后来书院的性质，因此对后世山西书院的影响很大。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芮城创建卜子书院，又称子夏书院或文学书院；

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芮城又创建西河书院,其名称显然就是因为卜子夏的缘故。

2、天下争说郭林宗

汉代,山西的私人教育继续发展,此时出现了一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就是郭泰。

郭泰(127—169年),字林宗,又字有道,山西介休人,是东汉时期一代儒林宗师。郭泰家世贫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度日。成年后,他身高八尺、魁伟。母亲想让他到县衙做事,但他却不屑于此。于是他向亲友借钱,长途跋涉去河南成皋一位大学者屈伯彦处求学。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他终于博通“三坟”、“五典”等古籍,并“善言谈,美音制”。

学成后,郭泰游学于京师洛阳。最初,众人对他都不甚了解。他后来名噪一时,主要借助于当时名士符融和李膺。符融初见郭泰,就被他的仪表和学识所折服,当即把他介绍给时任河南尹的李膺。李膺对郭泰也大表惊叹,认为他是少见的聪明、博学、高雅之人。年轻的郭泰能得到李膺的如此青睐,众儒生自然对他刮目相待,于是郭泰一时名震京师。但郭泰无意于仕进,后来还是向李膺辞别回乡。当时,洛阳当地的儒生、官吏一起到河边去送行,数千辆马车停满了河岸。林宗和李膺同乘一船,翩翩而行,众人远远看去,以为神仙飘然而至。还有一次郭泰正行路间,忽然下起雨来,他没有带避雨工具,便随手将头巾折起一角来挡雨,后来人们纷纷效法,故意将头巾折起一角,并把这种头巾叫做“林宗巾”。

汉桓帝建和(147—149年)间,太常赵典举荐郭泰,郭

泰坚辞不受。永兴(153—154年)间,司徒黄琼征召,他又不受。有朋友劝他应入仕途,他婉言谢绝,表示立志要“优游卒岁”,“淡泊终处”。他的这一行为被同郡人宋兴赞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匹敌者”。

郭泰虽淡于名利,不求仕进,但他却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东汉后期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冀诛灭。此后,宦官集团操纵朝廷大权30余年,他们残暴黑暗的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严重威胁了封建秩序。郭泰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政治局势,于游太学时通过义游、会友等方式,发动、组织耿直官僚、名士、太学生等共同与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作斗争。太学生们以郭泰等为领袖,对宦官集团口诛笔伐,甚至编顺口溜扬清激浊,褒贬朝政,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当时被称为“清议”,致使公卿以下无不惧怕太学生的清议。郭泰等领导的太学生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吏、士人的支持,他们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制造出了古代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致使太学生1000多人被捕,李膺、范滂等社会名流死于狱中,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郭泰虽为太学生领袖之一,因没有公开批评朝廷或得罪宦官,故得以幸免于难。此后,郭泰罢游回到家乡,闭门讲学。

由于郭泰声名极大,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从学弟子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不少弟子日后都成为名人。郭泰和孔子一样,有教无类,选取弟子以才德为标准,从不拘泥于门第

和出身。他乐于推荐、奖励有才德的人，因此和他交往的人，除官员、士人之外，还有漆工、邮役、士卒、屠户等人，只要德才兼备，他都极力推荐，引导其成名。

除此而外，郭泰还特别善于品评人物，知人论事恰如其分，很少差错，《后汉书》里就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有一位陈留人名字叫史叔宝，年纪轻轻就享有很高的声誉，林宗在见过这位青年名人后对别人评论道：墙很高，但基础薄弱，看起来有所得，日后必有闪失。后来史叔宝果然因为乱加议论而一败涂地。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郭泰卒于家中，时年42岁，从四面八方赶来会葬的人成千上万，不绝于途。郭泰的志同道合者共同为他刻石立碑，名士蔡邕还亲自撰写了碑文。事后，他感慨地对人说，他给别人曾写过许多碑铭，这些人在品德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欠缺，只有郭林宗才无愧于为其撰写的碑铭。于是后人称此碑为“无愧碑”。

郭泰一生博学多才，视仕途、利禄若浮云，礼贤下士，乐与常人为伍，有教无类，引导后学，被称为东汉第一名士。他在家乡设堂讲学，在山西私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3、桃李满门“文中子”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纷扰和封建割据，历史终于又走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期，这时山西又出现了一位集大成的文化巨人，他就是“文中子”王通。

王通(?—617年)，字仲淹，河东龙门(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文帝杨坚在位时，王通曾上书陈治国安邦十二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朝廷也任用他做过一些小

官，却始终没有重用他的意思。隋炀帝杨广继位，王通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可为，虽然又做了一些努力，但总不能如愿，便下决心辞官回家。

王通回到故乡后，闭门著述，聚徒讲学，走了传统文人和前辈圣贤实现自己理想的老路。他专心致力于《续六经》等著作的写作，并广招门徒，阐述自己的学说。他学识渊博，抱负远大，常以历史上的周公、孔子自许。他曾自信地说：千余年来，能真正继承和发扬孔子学说的，只有我一人而已。当权者如能用我治理国家，我一定会像周公那样竭心尽智。他的思想学说，上承孔孟，下接唐代韩愈，直至宋代理学。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如唐末学者皮日休曾指出，可继孟氏者，“惟文中子王氏”，而文中子之道，百代之后能得其真传者只有韩愈。

王通一生著作很多，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有其弟子编辑的《文中子中说》一书。“文中子”是王通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对他的私谥之号。

作为一个教育家和一代儒林宗师，王通的名声很大，相传跟从他的学生常年有数百人，他们从四面八方会聚到河汾之地，辩论学术，发表各自的见解，遇有疑难之处就求教于师。王通的学生大体上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他的家族成员，第二类是追随他学习的门人，第三类则是曾向他求教过的他的一些朋友和故交，这些人也向王通执弟子礼。

王通的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这支王姓族人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秦、汉、三国到魏晋，英才俊杰，层出不穷，簪缨相继，代不乏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

的威望。到王通及其后人时，太原王氏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通的弟弟王绩，是初唐时有名的诗人；孙子王勃，更是“初唐四杰”之一，他的诗赋脍炙人口，著名诗句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著名文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通的其他学生中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原温彦博及京兆杜淹等，他们都是唐初社会的干才。而王通的朋友兼学生中更有一大批兴邦谋国的智能之士，如绛州通守陈叔达、隰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人杜如晦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兴起于山西，王通又为其培养了这样雄厚的一支人才队伍，使得唐王朝 300 年辉煌的发展史始终与山西密切相关，也使得王通的政治理想通过他的学生得到实现。

王通的“河汾之学”在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聚众讲学也对后来山西的书院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嘉靖九年（1530 年）太原创建“河洛书院”，书院内设“三贤祠”，供奉着对山西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位先贤，王通即是其一。

从卜子夏西河讲学，到郭林宗有教无类，再到王通广招门徒，山西的私人教育从春秋战国时起就一直不绝如缕，虽然当时还没有“书院”这个名词，但他们所进行的正是日后书院所做的工作，因而已初具书院的性质。也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才为山西书院在宋以后的发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二、点燃星星之火

宋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各地书院犹如雨后春笋,相继而起。但当时山西书院的发展却刚刚起步,并且山西的第一所书院始建于与北宋同期的辽代,这与山西的特殊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这时山西的书院发展情形如何?

1、山西的第一所书院

龙首书院是山西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所书院,它的创始人是辽朝的邢抱朴。

邢抱朴,应州(今山西应县)人,生卒年代不详。他大约主要活动于辽代景宗耶律贤和圣宗耶律隆绪时期(969—1031年),相当于北宋太祖赵匡胤到仁宗赵祯时。

邢抱朴的父亲邢简是辽穆宗时的邢部侍中。其母陈氏,能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邢抱朴和他的弟弟邢抱质从小就受到母亲的良好教育,长大后,两人都以博学多才著名。如今在应县县城西南有一处古迹叫“一经楼”,传说就是当年陈氏课子读书的地方。

邢抱朴入仕后曾做过辽朝的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和参知政事等官,邢抱质也任过辽朝的一些官职。做官后的邢抱朴念念不忘母亲的教诲之恩,为追念母亲的功德,表达自己的敬意,就在家乡创建了一所书院,以应县境内最主要的山峰龙首山命名。

龙首书院的具体规模有多大?学生有多少?教材内容

如何？教学方式怎么样？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了。但它的创立，开启了山西建设书院的先河，从此，山西书院的发展纳入全国书院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2、宋金时期的山西书院

宋代，随着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教育的发展也得到了很好的机会，从宋仁宗开始，官府就在各府、州、县建学，到庆历以后，“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很快就成为宋代理学家的重要活动基地之一。咸平五年（1002年），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设立。同一时期，由于朝廷、士大夫和各级官吏的支持，石鼓书院（在今江苏苏州）、应天书院（在今江苏南京）、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丽泽书院（在今浙江金华）、紫阳书院、象山书院等一大批书院相继创立，以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一说睢阳书院）、石鼓书院（一说嵩阳书院）规模大，师资强，从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

宋代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积极进行学术文化交流，通过学术争鸣，由各自学术观点相近或相同的师生形成一个学术派别或流派，从而使之传承下去。因此书院的迅猛发展，使宋代的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在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下，宋代山西的书院也开始起步并走向发展。北宋年间山西长治创建了雄山书院，它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30公里的雄山上，至今遗迹尚存，这也是现在惟一留有遗迹的宋代山西书院。此外，据有关地方志研究人员考证，宋代山西地区还建有鹤山、稷山、柯山、濂

溪、冠山等书院，可惜由于战乱，多数书院都废弃了，只有平定冠山书院一直延续了下去。

金朝山西书院的发展，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知其详，惟一留下记载的仅有刘撝、苏保衡在浑源州翠屏山上创立的翠屏书院，而其规制如何，影响怎样，日久年长，今天也已无从得知了。

宋金时期，山西书院的创建未能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普遍和高潮迭起，其原因有二：第一，山西地处宋朝北边，是宋、辽、金频繁交战的前线和主战场，国难当头之际，兵刃交接之时，百姓流离失所，哪有心情办学？这样，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自然就受到影响，书院的建设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书院的创办主要是靠理学家来倡导和推动，书院的山长与主讲一般也是由理学家来担当，而这一时期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理学家们纷纷南迁，客观上也造成山西人才的短缺，因而也难以大兴书院。

3、元朝山西书院的勃兴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加强了政治思想的控制。在文化教育方面，元朝统治者比较注意保护书院制度，下令各行省恢复书院建设，积极引导理学北传，以收聚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时，山西作为元朝的“腹里”，社会环境趋于安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这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由于元朝书院保护政策的推动，山西很快修复了长治的雄山书院和平定的冠山书院等一批旧书院，并迅速建起了 14 所新书院，形成了山西书院